

种族认同，还是资源争夺

——苏丹达尔富尔地区冲突根源探析

姜恒昆 刘鸿武

内容提要 苏丹西部达尔富尔地区的暴力冲突并非始自 2003 年初，早在 20 世纪 80 年代该地区就出现了大规模武装冲突。由“萨赫勒”干旱引起的苏丹北部阿拉伯游牧民南下抢夺中部富尔人等非阿拉伯定居农民的土地是导致冲突的根源，而种族因素则既是前期冲突的结果，又是近期冲突的原因。靠武力并不能解决这场危机，结束冲突的正确途径应是承认冲突的环境和生态根源，合理分享这一生态脆弱地区的资源，恢复本地区的经济和社会结构，重新开始冲突双方的传统合作，并开创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新前景。

关键词 达尔富尔 冲突 资源 种族

作者简介 姜恒昆，云南大学世界史专业博士生（昆明 650091）；刘鸿武，云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昆明 650091）。

自从 1983 年南北战争再次爆发后，苏丹已被普遍视为一个由穆斯林同基督徒或者阿拉伯人同非洲人的分歧引发宗教、种族冲突的典型国家。尽管这样的定性可以对苏丹南北内战进行很好的描述，却不能完全说明达尔富尔地区冲突的起因和性质——更加集中于资源的争夺，而不是宗教信仰问题。¹ 该地区的确存在着阿拉伯或阿拉伯化了的种族同富尔人等土著非洲黑人之间的种族差异，也有争夺地方权力和追随不同党派等政治问题，但种族和政治问题并非冲突的根源（虽然被广泛地认为是引发新近冲突的两大原因），由于干旱和生态环境恶化引起的土地和水资源争夺才是冲突的起因，而作为前期冲突后果的种族认同则是新近冲突的一个重要原因。

主要种族及其分布

达尔富尔地区位于苏丹共和国西部，面积为 51.0888 万平方公里，约占全国总面积的 1/5，北接利比亚，西连乍得，西南同中非共和国为邻，东部和南部分别是科尔多凡和加扎勒河地区。当今，达尔富尔共有 80 多个族体，估计有人口 777 万，约占全国总人口的 20%，其中约有 60% 是以种地为生的农民。富尔人（Fur）是最主要的族体，因此该地区以达尔富尔为名^④；其余族体则大多是游牧或半游牧的牧民。由于历史上土著的“非阿拉伯人”和“阿拉伯人”长期杂居通婚，因此该地区的种族划分本身并不十分清晰。现在，那些“阿拉伯人”主要是靠其文化语言属性而不是种族属性来区分自己的。

¹ 自 2004 年初国内媒体开始关注达尔富尔冲突以来，许多报道认为，达尔富尔地区爆发冲突的原因是信仰伊斯兰教的阿拉伯人和来自中、西非国家信仰原始宗教或基督教的非洲黑人之间的长期不睦。而事实上该地区 90% 以上的人都是逊尼派穆斯林，他们并不存在宗教上的不睦。

^④ “Dar”，阿拉伯语，领地、家园之意，“Darfur”，意为“富尔人的家园”。

富尔人大多是农民, 占据着本地区的中央地带, 包括土壤最肥沃、水资源最稳定的杰贝勒马腊山地。在中央地带还生活着马萨里特 (Masalit)、贝尔提 (Berti)、巴尔古 (Bargu)、贝尔吉德 (Bergid)、塔玛 (Tama) 及通朱 (Tunjur) 等族体, 他们也都是定居农民。北端的扎加瓦地区是利比亚沙漠的一部分, 居住着放牧骆驼的游牧民, 主要是非阿拉伯血统的扎加瓦人 (Zaghawa) 和贝德亚特人 (Bedeyat), 以及阿拉伯血统的马哈里亚人 (Mahariya)、伊莱卡特人 (Irayqat)、马哈米德人 (Mahamid) 和贝尼侯赛因人 (Beni Hussein) 等。该地区是达尔富尔三地区中生态最脆弱的地区, 也是受干旱影响最严重的地区。由于对水草的争夺不断加剧, 当地的游牧民常常活跃在本地的武装冲突之中, 他们要么同定居农民争斗; 要么互相厮杀。达尔富尔东南地区的阿拉伯游牧民有雷扎盖特人 (Rezeigat)、哈巴尼亚人 (Habbaniya)、贝尼豪巴人 (Beni Halba)、塔艾沙人 (Taaisha) 和马阿里亚人 (Maaliyya) 等, 他们放牧的主要是牛, 而不是骆驼。虽然这一地区受降雨量的影响要比中央地区大, 且其生态稳定性也没有中央地区强, 但该地区受干旱的影响却远没有北部地区严重。除了放牧牛和骆驼的游牧民之间, 以及他们同定居农民之间有明显的差异外, 达尔富尔地区还有一个重要的市民阶层, 他们是“杰拉巴” (Jallaba)¹ 商人、政府官员和其他职业者。“杰拉巴”商人在达尔富尔的商业利益主要是游牧民所饲养的牲畜, 虽然他们人数不多, 但对中央政府的影响很大。

生态界线与种族界线

多数情况下, 生态界线也即种族和文化界线; 不同生态区要求不同的社会生产体系——这在达尔富尔地区意味着不同土地的不同使用方法。达尔富尔的生态区主要有: 以牧驼为主的北部干旱生态区、以牧牛为主的南部半干旱生态区, 以及以定居农耕为主的中部生态区。游牧生产方式在达尔富尔北部和南部的干旱与半干旱地区是适宜的, 而定居农耕生产方式在中部杰贝勒马腊山地也是可行的。

许多年来, 北部和南部的游牧民形成了同中部的定居农民截然不同的文化与种族特点。当他们进行合作时, 他们之间的生态和种族分界并不十分明显; 然而, 当他们发生冲突时, 生态界线就成了种族界线。通常, 一个生态环境恶化了的区域的人、畜向另一个已为其他种群所占据的生态区的迁移是引发关系紧张和敌对的直接原因。如果分享土地的要求是临时性的, 有条件的协议还是有可能达成的, 但如果这一分享要求是长期的, 甚至是永久性的, 那么种族关系必然会非常紧张。^④ 达尔富尔地区的冲突正是如此——受干旱影响的北部生态区的牧民和牲畜向定居农民占据的中部生态区的迁移是引发达尔富尔冲突的最直接和最根本的原因。

对不同生态习惯的适应情况还会在诸如思想文化、社会组织, 以及衣着和语言等主要的种族认同标准方面产生相应差异。一旦在共享资源的分配上发生争执, 这些种族差异会变得异常危险, 其结果是在那些生态边缘地带常常引发相邻种族之间更大的结构性冲突。冲突爆发后, 由于每个竞争者都要寻求最大限度的支持, 种族划分和种族认同就成了号召团结对敌的最佳手段。

过去, 不同种族的人们在交换物品及共同利用可更新资源等问题上的主要倾向是在缓冲地带进行合作。在这种情况下, 种族或生态界线是合作的界线, 而不是对抗的界线。但是, 由于环境、社会和经济的压力, 人们对水和土地等自然资源的竞争加剧了。战争与和平的天平已经逐渐地, 有时甚至是剧烈地由相对稳定偏向了对抗。达尔富尔北部的游牧民就是最典型的例证。^④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 饱受长期干旱的扎加瓦人和马哈里亚等阿拉伯游牧民开始进入杰贝勒马腊山地, 并不打算在干旱结束

¹ 杰拉巴, 指城市化了的苏丹阿拉伯商业阶层, 他们是古阿拉伯商人的后裔, 现为苏丹最富有的阶层, 遍布苏丹全国, 并进入了苏丹的一些邻国。杰拉巴在苏丹近现代历史上有着相当大的政治和经济影响。

^④ See Ali B. Ali - Dinar, "Between Naivasha & Abcheh: The Systematic Destruction of Darfur", <http://www.darfurinfo.org/abedhrava.html>

^④ 在非洲, 类似事例还有: 努巴山区的巴卡拉人同努巴人之间的冲突、尼日尔和马里的柏柏尔人冲突、塞内加尔的卡萨芒斯冲突, 以及埃塞俄比亚南部博兰地区的骚乱等。

前离开那里。在受干旱威胁的牧民试图通过侵占肥沃的中央地带来维持生计的同时，定居农民也为守护他们认为属于“自己的”土地而进行了坚决还击。于是，暴力冲突便不可避免地发生了。

冲突的根源

像大多数非洲大陆的地区一样，苏丹人和动物的生存也依赖于土地、气候、水和植物之间的微妙平衡。在过去的30多年里，这一平衡被长期旱灾所打破，达尔富尔地区尤其如此。由于降雨量减少、害虫横行及生产投入的匮乏，粮食产量一直很低，牲畜数量也因水草不足而日益减少。事实上，自1967年以后苏丹的降雨量一直很低，1998年以来更是连年大旱。这最初被认为是过度放牧和乱采滥伐致使植被遭破坏而导致的后果，现在还被认为是全球变暖引起海洋温度变化的结果。¹后一种解释意味着苏丹的干旱不是一次普通干旱，而是气候的永久改变。因此，对肥沃湿润土地的争夺便是达尔富尔冲突的一个难以消除的根本因素。

在尝试理解生态变化对达尔富尔地区战争与和平状态的影响时，最值得考虑的因素即：当地的定居农民和游牧民被自然条件互锁于一个复杂的合作或冲突关系之中。他们能够在常规困难面前友好相处，共渡难关，但在关乎生死存亡的困难面前极有可能选择暴力手段。对拥有保护部落安全的准军事组织的游牧民来说，武装袭击富饶的农业地区，及同敌对部落发生小规模冲突于是成为他们生活方式的一个组成部分；在面对严重自然灾害和生存威胁时，暴力手段也就成了他们首选的一种生存方式。虽然富尔人和其他农民传统上不曾有过类似的准军事组织和军事行为，但同游牧民的关系却一直在因牧民的畜群闯入农田而进行的谈判或敌对之间交替着。过去，那些受干旱影响的牧民只是临时迁入中部的比较好的生态区，但自20世纪80年代后，这一“暂时躲避”却因受到环境全面恶化、人口不断膨胀、大规模机械化农业扩张、政局动荡及种族关系紧张等因素影响而逐渐变成了“强行霸占”。

北部游牧民对中央地区耕地的强占是引发并加剧冲突的直接而系统的驱动力。南下的游牧民中有些是为了给其牲畜寻找水草，但更多的人则已失去牲畜，因此是在寻求久居地。进入城镇的扎加瓦人靠做小生意得以维持生计，但留在农村的那些人却遇到了富尔农民和当地政府军警的敌对，因为富尔人认识到北方游牧民的这次迁移可能是永久性的，而当地政府则指责他们是盗窃骆驼者。当地政府中的富尔精英们也只是一味地反对游牧民侵入，而不是寻求和解。

冲突的模式在不停地变化，从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的低烈度、间歇性和小规模升级到80年代的高烈度、持久性和大规模。早期的冲突主要是游牧民之间为争夺水草或偷盗牲畜而发生的交火。但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达尔富尔北部相对平稳的局面被不断升级的武装冲突彻底打破了，先是1983至1987年的扎加瓦人、马哈里亚人同富尔人的冲突，接着是1987至1995年的阿拉伯人联盟同富尔人的对抗。

冲突的规模也因大量现代化武器的涌入而近似于内战了。武器的大量流入首先是由于萨迪克·马赫迪在任总理期内（1986~1989年）对南部的“巴卡拉”^④牧民和北部的阿拉伯游牧部落的武装纵容，因为他想把前者作为对抗苏丹人民解放军的民兵力量（即“穆拉哈林”民兵组织），而后者则一直忠诚于他领导的乌玛党所属的安萨教派；其次是由于与达尔富尔相邻的乍得的权力斗争对该地区的外溢效应。当时的反对派领袖扎加瓦人代比（乍得现总统）就是利用苏丹领土向乍得政府军发起进攻的。就这样，扎加瓦人也获得了现代化武器，因为作为跨境民族，他们既是安萨教派的效忠者，也是

¹ See D. Michelle Danke, "Civil War in the Sudan: Resources or Religion?", <http://www.american.edu/TED/ice/sudan.html>

^④ 巴卡拉 (Baggara)，原意为“牛”，变为广义的族名后，泛指在南达尔富尔和科尔多凡的“萨凡纳”气候区放牧牛群的一些阿拉伯游牧部落，他们有着和丁卡人在北加扎勒河和南科尔多凡争夺牧场的传统。

代比的同盟军。¹ 为了报复,乍得前总统哈布雷则帮助并武装了富尔人。

“萨赫勒”干旱、基于种族原因的政府偏袒及邻国的权力斗争等因素交织在一起,分化了当地的族群,他们的认同和相互关系就这样被彻底地改变了。冲突也随之变得更加错综复杂,从而导致了 27 个阿拉伯游牧部落于 1986 年结盟,并共同向当地的富尔人和非阿拉伯部落宣战。富尔人的对策是组织自己的民兵,最初他们只是出于自卫,但后来却成了同苏丹人民解放军关系极为密切的一个反政府武装。^④ 尽管阿拉伯游牧民的主要目标是夺取土地,他们在袭击之前也常常“通知”富尔村民给他们的“解放”或“清洗”部队让路,但冲突付出的人口和资源的代价仍然是非常高的。⁽⁴⁾ 虽说 1989 年的和平会议临时性地解决了一些问题,但冲突并没有停止。从 20 世纪 90 年代初至 2003 年重新爆发大规模武装冲突,达尔富尔的许多地区一直都处于无政府的混乱状态。

旧冲突的产物、新冲突的起因

事实上,这场血腥冲突的对抗双方有过一段很长的警戒性合作和相对和平共处的历史,甚至阿拉伯牧民饲养的一些牧群是属于富有定居农民的。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以前,阿拉伯人同富尔人等非阿拉伯人虽然因土地问题和牲畜侵扰而时常发生小冲突,但他们从未进行过大规模战争。他们之间存在的一些小的种族障碍可以通过通婚,或者类似的同化过程友好而轻易地加以解决。因此,目前他们之间的明显分裂和敌对的种族立场更多的是早期冲突的产物而非其原因。不仅冲突的所有参与者都是逊尼派穆斯林,并将阿拉伯语作为他们的母语或混合语,而且他们属于某个特殊种群的认同感在 20 世纪末期的大规模冲突之前也不含种族敌对之意。不同的达尔富尔群体之间的相互认同并非是顽固的种族认同,因此在冲突发生前他们也不是以种族认同来处理相互的关系。

在达尔富尔,种族划分的诸如领土、语言、职业和家系等标准只是一种非固定的情势现象,真正的种族识别还应包括处于该情势中的参与者的判断。比如在交易场所,基于人种和传统的外貌与衣着并不是有用的识别方法,语言(通常是作为混合语的阿拉伯语)起着特别重要的作用。只有对语言表达不满意时,交易各方才会求助于其他的一个或多个标准作为附加标准来识别彼此的种族身份,从而寻求与交易伙伴的种族有关的交易方式。而事实上,即使是占优势地位的富尔人、阿拉伯人和扎加瓦人之间,明显不同的种族归属也是经常变动的。例如图拉地区被认为有阿拉伯血统的扎瓦马人(Djavama),在定居图拉地区以后逐渐变成了富尔人,而特克拉地区有阿拉伯血统的特克拉人和阿拉伯雷扎盖特人也变成了扎加瓦人。⁴

然而,由于 1982 至 1985 年的严重干旱,定居农民卖掉了自己的牲畜,一些阿拉伯牧民因此丧失了生活经济来源。经济联系的断绝加剧了定居农民同阿拉伯人之间的紧张关系。随着双方冲突不断扩大,种族分化变得愈加严重。人们对各自的种族认同十分敏感,而他们以前共有的政治和宗教忠诚也逐渐萎缩了。相反,种族分化的各方为了各自安全而放弃了彼此间的团结和互惠。经过 20 多年的冲突,种族认同因人们被种族敌对而固定在各自的种族内部的事实更加确定无疑了。的确,作为感知早

¹ 苏丹同乍得之间的跨界民族问题也是达尔富尔冲突的一个额外因素。据乍得 1993 年人口统计,在 16 个生活在乍得的跨境民族中,扎加瓦人约有 7.8 万,马萨里特人约有 5 万,阿拉伯游牧民则超过了 76 万人。而生活在苏丹的这 3 个种族是达尔富尔冲突的主要参与者。See: "Sudan: Chad and the Darfur Conflict", <http://www.innnews.org/webspecials/SudanDarfur/Ftr-Chad.asp>

^④ 这次反政府运动实际上是 1991 年“苏丹人民解放军”企图进入达尔富尔的一次尝试,但最终失败了。该运动的领导人 D. Y. 伯拉德(Daoud Yahya Bolad, 1952-1991) 是富尔人,曾是狂热的伊斯兰主义分子(穆斯林兄弟会成员,喀土穆学生会领袖及全国伊斯兰阵线骨干分子)。1986 年 27 个阿拉伯部落结盟对抗富尔人后伯拉德站在其同胞一边,并开始疏远全国伊斯兰阵线。1989 年政变后,他加入“苏丹人民解放军”,并于 1991 年领导了达尔富尔南部的这场反政府武装运动。失败后被俘,同年底在审判前死于狱中。

⁽⁴⁾ <http://www.sudanupdate.org/REPORTS/PEOPLES/Darf.htm>

⁴ See Abdul-Jalil, M. A., "The Dynamics of Ethnic Identification in Northern Darfur", in *The Sudan Ethnicity and National Cohesion*, Bayreuth, Germany, 1984.

期冲突的种族认同已成为新一轮冲突的一个真实原因。

2002年7月和8月，苏丹政府以涉嫌筹划成立名为“达尔富尔解放阵线”（Darfur Liberation Front）的分离组织为由，逮捕并关押了66名富尔人，但他们并未被正式起诉。此事件成了达尔富尔反政府运动的开端。2003年初，流亡海外的苏丹人权激进分子称达尔富尔的冲突正在由种族清洗发展为种族灭绝。他们谴责苏丹政府支持阿拉伯民兵对富尔人、马萨里特人和其他非阿拉伯当地人进行集体屠杀。¹2003年2月，主要由富尔人和马萨里特人组成的“苏丹人民解放运军”（“SPLA”，其前身便是“达尔富尔解放阵线”）和主要由扎加瓦人组成的“正义与平等运动”^④以苏丹政府忽视该地区的发展及未能保护他们免遭阿拉伯民兵的袭击为由，向政府发起了武装袭击，要求实行地区自治并分享财富。自此，以“苏丹人民解放运军”和“正义与平等运动”为一方，苏丹政府军及其支持的“坚杰维德”^④阿拉伯民兵组织为另一方的大规模武装冲突拉开了序幕。

迄今，达尔富尔的近期冲突已造成10多万人死亡，150多万人流离失所，而亟需人道主义援助的人口则有200多万。为此，联合国已将达尔富尔列为目前世界上人道主义危机最严重的地区。据联合国今年3月统计数字，在过去18个月中，苏丹达尔富尔地区另有18万人间接死于冲突（因疾病和营养不良等致死）。⁴尽管联合国和非洲联盟等国际组织、美英等西方国家，以及尼日利亚、利比亚、乍得和埃及等非洲国家一直都在为结束冲突付出努力（包括调停、威胁制裁和派遣维和部队等），且冲突双方也进行过多次并正在进行着和谈，但整个达尔富尔地区三州的局面仍然十分紧张。

结 论

大多数暴力冲突最初是为了争夺物质资源，不管其是真实的还是感知的，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种族、文化和宗教等附属物就会由意识形态范畴向社会力量转化。从广义上看，它们本身就变成了社会物质资源，因此也就成为暴力冲突的可能目标。就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前的达尔富尔而言，其冲突并不很多，且是局部性和低烈度的，正是由持续干旱引发的土地和水资源争夺沉重地打击了当地牧民同农民之间的合作传统与合作精神，也打击了双方原有的宽容。在政府的不当政策、乍得国内冲突的外延及现代武器流入的促使下，小冲突最终变成了大规模武装冲突。由于冲突中的人们只有在种族和文化的壁龛中才可找到安慰，因此冲突被广泛地感知为一种种族间冲突。超越种族和地域界限的政治忠诚虚无化了，种族认同随之变得极为重要，大多数人也因此把这场冲突视为种族间冲突了。

达尔富尔地区的武装冲突断断续续持续了20多年，当地民众对冲突的种族性质也由感知转化为确信。无论如何，种族认同已成为该地区的一股强大社会力量。如果不能承认危机的环境和发展根源，并通过协商公平合理地分享这一生态脆弱地区的资源，不能恢复本地区的经济和社会结构，不能重启冲突双方的合作，并开创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新前景，不断加剧的种族敌对将会持续存在。接踵而来的是努力解决冲突不断受阻，而已形成的种族敌对也将成为未来更大规模暴力冲突的具体而真实的原因。

（责任编辑：徐 拓 责任校对：吴传华）

¹ See “Darfur Liberation Front, Sudan Liberation Movement (SLM), Sudan Liberation Army (SLA) and Justice and Equality Movement (JEM)”, <http://www.globalsecurity.org/military/world/para/darfur.htm>

^④ 2003年底有报道称，“正义与平等运动”得到了哈桑·图拉比的支持，他对此予以坚决否认，但2004年3月底，他却因涉嫌与一起据称是由“正义与平等运动”策划的政变阴谋有关而遭苏丹政府逮捕。此事件常被用来证明达尔富尔冲突是中央权力斗争的结果。

^④ 坚杰维德（“Janjaweed”，阿拉伯语，意为骑马带枪的人）是新近冲突爆发后在政府要求当地社团“自卫”的号召下出现的民兵组织，主要由达尔富尔当地的阿拉伯人和来自邻近国家的武装分子组成。

⁴ 关于达尔富尔冲突的详细进程和伤亡情况可参看“自由百科全书”（Wikipedia）网有关该冲突的条目。

Racial Identification or Resource Competition: Root of Sudan' s Darfur Conflict

Jiang Hengkun & Liu Hongwu

pp. 9– 13

It wasn' t from the early 2003 that violent conflict in West Sudan' s Darfur region began to occur. In the early 1980s, large– scale armed conflict had erupted in this region. The root of the conflict lies in Arab nomads in Northern Sudan driven by the Sahel drought going to the south and robbing the non– Arab settlers (e. g. Furs) of their lands. The racial factor is not only the result of the earlier conflict, but also the cause

for recent conflict. This crisis cannot be solved by force. To acknowledge the environmental and ecological roots of the conflict, share reasonably the resources in this ecologically fragile region, restore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structures of the region, resume the traditional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two sides, and initiate a new prospect for socio– economic development is the right way to put an end to this conflict.

Africa: A Winner in WW ⑦

Gu Zhangyi

pp. 14– 18

The article argues that the reasons why Africa was a winner in WW ⑦ can be demonstrated as follows. In WW ⑦, the three fascist regimes of Germany, Japan and Italy were completely defeated; the old– line colonialist powers of Great Britain and France were weakened; Africa' s strength was strengthened through tak-

ing the opportunities for self – development; and Africa' s political awakening and the level of recognition were upgraded. In a word, Africa' s victory not only enabled Africa to avoid the misfortune to be oppressed by fascism, but also paved the way for post-war national independence.

Frobenius' Views on African Studies and Their Influences on Senghor' s Negritude Theory

Zhang Hongming

pp. 24– 30

The main viewpoints of the German anthropologist Leo Frobenius on African studies can be summarized as follows: Africa has a history and civilization of its own, the black people are creators of African history and civilization, African black civilizations share certain characteristics, different civilizations possess their characteristics and advantages, and interexchanges among dif-

ferent civilizations are the trend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human civilization. The above – mentioned points of view developed a school in European academia at that time, they also exerted profound influences on the advocates for Negritude Movement, and became an important ideological source for Senghor' s Negritude theory.